

研究論文

不經意的全球化想像：電視國際新聞中的多國新聞和國際組織

李立峯

摘要

在全球化的時代中，世界各國的事務以及人民的生活越來越息息相關。但國際新聞在多大程度上及以甚麼方式反映了全球化這一社會現實？本研究以「不經意的全球化想像」為概念切入點，強調的不是新聞媒體如何開宗明義地討論「全球化」，而是全球化想像有沒有，及如何成為新聞內容背後的基本假定。具體操作上，本研究集中探討電視國際新聞中的多國新聞和國際組織。透過分析16個國家和地區的電視國際新聞，我們發現，多國新聞和涉及國際組織的新聞的比例仍然不高，代表世界各地的電視國際新聞仍未全面反映全球化的趨勢。同時，一個國家的電視新聞在多大程度上展示不經意的全球化想像，跟國家的特徵沒有太大關係。相反，在電視台的分析層次上，我們發現，越多駐外記者的媒體，越不依賴廣告收入的媒體，以及越多元的媒體系統所提供的國際新聞有更大程度的不經意的全球化想像。文章會討論研究的理論意義以及未來分析的方向。

關鍵詞：不經意的全球化想像，國際新聞，多國新聞，國際組織，比較分析

李立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興趣為政治傳播、民意研究及媒體經濟。電郵：francis_lee@cuhk.edu.hk

Banal Global Imagination: Multi-nation Storie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Television Foreign News

Francis L. F. LEE

Abstract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has led to increasing interconnectedness betwee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s. But to what extent and in what ways does television foreign news reflect this reality of globalization? This article employs the concept of “banal global imagination” as an entry point to tackle the question. The emphasis is on whether and how globalization has become the basic assumption behind news contents. More concretely, this study examines multi-nation storie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television foreign news. An analysis of television news of 16 countries shows that the percentage of multi-nation storie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stories remains low. It shows that globalization has yet to become a basic assumption behind much of news contents. At the same time, there is no relationship between country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extent of multi-nation/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stories in television news. In contrast, at the level of television station, we find that television stations with more foreign correspondents, stations less reliant on advertising revenue, and stations in more diverse media systems are more likely to cover more multi-nation storie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stories. The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findings are discussed.

Keywords: banal global imagination, multi-nation stori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eign news, comparative analysis

導言

在全球化的時代中，世界各國的事務以及人民的生活越來越息息相關。金融海嘯、全球暖化、新型病毒散播等議題和事件固然展示了各國之間唇齒相依的關係和通力合作的重要性，但亦突顯了多邊協商的難度。在這些危機事件之外的日常生活中，透過旅行或接待外國遊客、出國留學或工作、於跨國企業中與其他國家的同事合作、觀賞外國媒體、與移居他方的親友聯繫等等，人們跟「外國」的接觸越來越多。如此種種，都切合了社會學家 Anthony Giddens (1991: 64) 近 20 年前對全球化作出的定義：「世界各處的社會關係變得密切，使得相隔很遠的地方都被連繫起來，在一個地方發生的事情往往被萬里之外所發生的事情所影響，反之亦然。」

既然人們的生活越來越受到其他地方的事情影響，人們對世界事務的關注程度理應越來越高，另一社會學家 Roland Robertson (1992: 8) 對全球化的定義，就強調全球化包括「世界的壓縮以及對世界作為一個整體的意識的強化」。但在現實中，人們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意識到世界事務對自己的生活和社會的影響，以至全球一體化的趨勢呢？

正如 Walter Lippmann (1997/1922) 於差不多一個世紀前指出，人們對世界的認知，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新聞傳媒如何為受眾建構一個「世界」的圖像。而在今天的社會，電視新聞中的國際新聞可能特別重要。雖然在媒體發達的「全球都市」中 (global cities) (Sassen, 1991)，人們往往可以直接通過電視或互聯網接觸外國媒體，但本土的新聞傳媒仍然是大部分人最重要的資訊來源。而作為影音媒體，電視又比文字媒體或其他廣播更有威力。人們在腦海中的世界圖像，應該與他們從電視上吸收到的影像和資訊密切相關。

在以上的背景下，本文的主要研究問題是：當今世界不同國家的電視國際新聞，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全球化這一社會現實？對全球化的反映跟新聞內容的其他特徵有甚麼關係？甚麼因素影響到不同國家的電視新聞對全球化的反映？

需要在開首說明的是，「全球化」本身可以是一個在新聞中被談論的議題，例如當新聞報導世界貿易組織的會議時，就大多數會涉及會

場以外的「反全球化」示威，過去亦有一些新聞學研究專門分析傳媒如何報導這些有關「全球化」的爭議(如Deluca & Peoples, 2002; McFarlane & Hay, 2003; Lee, 2008)。另外，在一些如有關北京奧運或09年底哥本哈根氣候變化會議的報導中，雖然「全球化」一詞未必會出現，但由於事件涉及世界上為數眾多的國家的參與，故其「全球性」亦非常明顯，過去的研究當然也不乏對傳媒如何報導「全球性媒體事件」(global media events)的分析(如Giffard & Rivenburgh, 2000; Lee, Chan, Pan & So, 2002; Latham, 2009)。不過，本研究所分析的並不是新聞媒介如何開宗明義地談論全球化，亦不集中分析媒介如何報導「全球性」非常明顯的事件。本研究嘗試的是以兩個簡單的指標，即多國新聞及國際組織出現的頻率，展示「全球化」這一社會現實在多大程度上成為日常的國際新聞內容背後的基本假設。在理論上而言，借用Billig (1993)的「不經意的民族主義」(banal nationalism)這一概念，本研究的關注點可以被稱為「不經意的全球化想像」(banal global imagination)。

下文將首先闡釋「不經意的全球化想像」這概念以及多國新聞及國際組織跟全球化的關係。之後，本文會設立具體的研究問題和假設。其中，本研究亦會試圖將「不經意的全球化想像」這概念跟一些過往國際新聞內容研究的主題作出連繫，尤其重要的是國際新聞過分集中於報導具影響力的國家這一點上(Galtung & Ruge, 1965; Chang, 1998)。本文然後會依據研究問題和假設，分析世界各地16個國家和地區的電視國際新聞。最後我們會討論研究發現的理論意義和啟示。

不經意的全球化想像

Billig (1993) 在《不經意的民族主義》一書中，指出要了解民族主義為甚麼能夠引起人們強烈的情緒，甚至有人會因「國家」或「民族」之名犧牲生命或殘害他人，我們不只要留意民族主義或愛國情感最顯著和最強烈的表達方式，亦要了解民族主義和國家概念如何以毫不起眼的方式存在於人們的日常生活和環境當中，例如那些掛在政府大樓和公營機構門外的國旗、公務員制服上的徽章、特定的與傳統文化或國家歷史有關的節日，如此種種，都以最不經意的方式，象徵着「國家」的

存在，人們在一般的時候不會在意這些國家的標誌，但這並不代表人們沒有民族情感。相反，人們的「不在意」顯示了民族和國家概念已經成為人們的常識 (common sense)。所以，Billig 認為，最能夠代表民族主義的旗幟，不是那幅在大型體育競賽時被國家隊支持者激烈舞動着的旗幟，而是那幅掛在政府大樓外完全不惹人注目的旗幟。

借用 Billig (1993) 的觀點，如果我們要分析傳媒如何建構民族主義或國家的概念，我們的着眼點就不應只有一些有顯著民族和國家色彩的媒介產物 (如電影《建國大業》、中央電視台的春節聯歡晚會等)，又或是在國際體育賽事中媒介的評述員如何為自己國家的代表吶喊助威。我們亦應該留意國家或民族的概念是如何滲透在所有媒介產品之中，成為媒介內容背後的不顯眼的假設 (Edensor, 1997)。例如新聞報導在提及其他國家的領導人時，通常都要明確地表明所談及的是那一個國家的總統、總理，或其他領導人，但在提到自己國家的領導人時，國家的名字就可以略而不提，這就是新聞報導「屬於」某個國家的其中一個不顯眼的象徵。¹

同樣道理，如果我們要分析新聞媒介如何建構有關全球化或者世界的圖像，我們亦不應該只關注一些將全球化或整體世界局勢作主題探討的報導。當然，主題式的報導有其重要性，一個國家的新聞媒體如何談論全球化，很可能影響到人們對全球化的利弊的判斷。李立峯等傳播學者在 06 年於中國大陸四個城市的調查研究就發現，使用國家級傳媒 (相對於本地傳媒和外國傳媒) 越多的大陸人民，對全球化抱持越正面的態度和認知 (Lee, Lee, He, Lin & Yao, 2009)。李立峯等指這是因為中國政府視更全面地「進入世界」(enter the world) 為國策 (Zhao, 2003)，而國家層級的傳媒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黨國的宣傳工具，故此大陸傳媒大都對全球化抱持着正面的態度。

但除了主題性的報導外，新聞媒介亦透過各種不經意的方式，塑造有關世界的圖像。事實上，單單是透過選擇性地對不同國家作不同程度和類型的報導，媒介的國際新聞便可能在不知不覺間塑造了受眾心目中的世界地圖。又如周葆華在本期另一篇文章指出，傳媒機構在報導外國新聞時多強調災難和衝突，可以塑造出一個可怕的世界，突顯出「本國」的安全及和諧。在更基本的層次上，新聞媒體慣性地將其

報導的內容分為「本地新聞」、「國家新聞」，以及「國際新聞」，本身就預設了一種國家觀念和一種世界觀，就是說媒體的受眾都屬於一個地方，這地方存在於一個國家之中，而這國家則跟其他國家存在於一個國際社會之中。而現代社會的人們，就是通過日常使用的傳媒，不停地鞏固著這個習以為常的世界觀(Nerone & Barnhurst, 2001)。

那麼，國際新聞中的哪些部分或特徵，可以被視為不經意地建構或表達了全球化的社會現實呢？本文的分析將集中在兩個簡單的指標上。第一，正如文章開首時指出，全球化最基本的意義，在於不同國家和地方所發生的事情，越來越傾向會有相互的關聯或影響(Giddens, 1991)。在這情況下，國際新聞應更傾向成為「國際間」的新聞，而並非只是有關某一國家或地區的新聞。固然，一則新聞故事會否涉及多個國家，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會取決於事件的本質。如果比較一場發生在美國加州的山火以及美國的金融危機，後者無疑更明顯地會影響到世界上其他國家。同時，就算是同一則新聞，新聞機構採納的報導框架也可能影響到涉事國家的數目。如97年的香港回歸，在大陸傳媒眼中，主要是一個殖民地回歸祖國的故事，跟世界其他國家的關係不大，但在一些歐美媒體眼中，香港回歸卻涉及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世界之間的關係。在後者的報導框架之下，被視為跟事件密切相關的國家數目會更多(Lee et al., 2002)。但無論如何，在全球化的趨勢下，明顯地涉及或影響多個國家的事件應有所增加，如果新聞機構亦開始更多以「全球」的視角審視世界的話，那麼涉及多於一個國家的國際新聞的比例就應該上升，而新聞故事中涉及的國家的數目亦應有所增加。對受眾而言，如果他們在傳媒看到的新聞經常都涉及多個國家，這些新聞內容就可能在不經意之下給予他們一種「全球化」的印象。

第二，傳媒對國際組織的報導，亦可被視為全球化的一種反映。Benedict Anderson (1991)指出，現代社會對國家的想像是有其特點的，其中包括國家是有限的和有主權的(limited and sovereign)。但全球化的發展，正為國家主權帶來了挑戰，因為世界上越來越多的問題，無論是版權法的制定和執行、如何應對現今的金融危機，又或是為對抗全球暖化而作出的環保措施等，都需要不同國家共同合作或通過協商來解決。在這情況下，國家政府往往需要在「主權」上作出妥協(Held,

1995; Habermas, 2001)。同時，國家政府雖然在國際問題上仍然是非常重要的行動者，但其他組織和機構，例如跨國企業和不同類型的國際組織，也扮演著越益重要的角色。根據Kapur (2002)的闡釋，國際組織的重要性，在於它們可以減低多邊協商和交易的成本、為不同的議題製造連繫、為討論提供平台、為合作提供資源，並仲裁會員之間的紛爭。國際組織的憲章或規條可被視為國際間協商的規範，令參與國際行動的會員可以對其他參與者的行為有所預期。另一方面，於民間成立的國際性的非政府組織，則整合各國的民間資源和力量，於國際社會中就重要的議題發表意見，組織跨國的集體行動，並向國家政府及以政府為會員單位的國際組織施加壓力 (Tarrow, 2005; Della Porta, 2006)。在今天的世界上，要對世界事務有全面的了解，尤其是涉及「全球管治」的問題時 (global governance, Nayyar, 2002; Held & Koenig-Archibugi, 2003)，國際組織的角色是不容忽視的。不過，媒介所提供的國際新聞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國際組織的地位呢？這本身就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而在本文的關注點下，國際組織在新聞報導中的位置，亦可顯示新聞報導內容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全球化的現實。

研究問題及假設

總括而言，本文將透過分析電視國際新聞中的多國新聞及國際組織，探討電視國際新聞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全球化的趨勢。在提出研究問題和假設之前，可以先說明本文的其中一個特點，就是它會因應研究問題和假設的需要，在不同的分析層次上對數據進行檢驗。更具體地說，由於本研究運用的是一個包括16個國家和地區共超過30個電視台的內容分析數據，所以我們在分析單位上可以有不同的選擇，除了以新聞故事為分析單位外，我們亦可以用電視台以及國家作為分析單位。有一些假設至少在理論上可以同時在三個層次上進行分析，例如當假設涉及的是兩種新聞內容特徵之間的關係時，我們可以在分別三個層次上設立三個假設(或同一個假設在三個層次上的不同版本)。如果該兩個內容特徵是甲和乙的話，三個層次上的假設會是：1) 在新聞故事的層次上，一則故事如果有特徵甲，它就更可能存在特徵乙；

2) 在電視台的層次上，如果一個電視台的新聞有特徵甲，這個電視台的新聞就更可能存在特徵乙；3) 在國家的層次上，如果一個國家的電視新聞有特徵甲，這個國家的電視新聞就更可能存在特徵乙。我們以下提出的第一個研究假設，就會同時涉及這三個分析層次。不過，有一些假設則只適合在其中一個層次上進行分析，例如有關新聞內容特徵和國家特徵的關係，就只適合在國家層次上探討。

回到本文的分析重點。由於本研究旨在分析電視國際新聞中的多國新聞及國際組織，所以我們首兩個用以指導分析的研究問題如下：

RQ1：不同國家的電視新聞中，一般國際新聞故事會涉及多少個國家？多國新聞的比例佔多少？

RQ2：不同國家的電視新聞中，國際組織在國際新聞故事中佔多顯著的地位？不同類型的國際組織的顯著程度有沒有分別？

RQ1與**RQ2**只是兩個描述性的問題，但它們為其後的分析提供基礎。再進一步，我們可以分析多國新聞和國際組織在國際新聞報導中會否有所關聯。從概念上而言，既然本文認為多國新聞和國際組織均為「不經意的全球化想像」的指標，那麼它們兩者之間或應有所連繫。另外，國際組織本來就是為處理影響多國的事務而存在的，一則提及國際組織的新聞故事，也應該有更大的機會是一則提及多個國家的新聞。如上所述，由於假設涉及兩種新聞內容特徵之間的關係，我們設立了不同分析層次的假設：

H1a：一則提及國際組織的國際新聞，其提及的個別國家的數目會較多。

H1b：在電視台的分析層次上，如果一個電視台的國際新聞中越多提及國際組織，該電視台的國際新聞也會有較多的多國新聞。

H1c：在國家的分析層次上，如果一個國家的電視國際新聞中越多提及國際組織，該國家的電視國際新聞也會有較多的多國新聞。

在多國新聞及國際組織之間的關係之外，我們亦會探究兩個指標和其他新聞內容特徵之間的關聯。首先，我們可以留意，涉及多個國家及國際組織的新聞，會否在新聞報導中更顯著，例如故事較長或在新聞議程中佔較前列的位置。分析這個問題，可以讓我們觀察到電視新聞對這種較能反映全球化的國際新聞會否特別重視。不過，我們沒有特別的理論或實際上的理由認為現時的電視新聞一定會對多國新聞及國際組織特別重視。所以我們提出的是一個研究問題：

RQ3：涉及多國及國際組織的新聞會否在新聞報導中佔據着更顯著的位置？

過去不少有關國際新聞內容的研究探討國際新聞流向(例如 Galtung & Ruge, 1965; Chang, Shoemaker & Brendlinger, 1987; Johnson, 1997; Kim & Barnett, 1996; Swain, 2003; Wu, 2000, 2003)。這些研究指出，一個國家發生的事情會否成為另一個國家的媒體所報導的國際新聞，一方面取決於兩個國家之間的關係(如雙方是否重要的貿易伙伴)，另一方面亦取決於幾個重要的「新聞價值」。而其中一個重要的新聞價值，就是一個國家本身是否具有「顯要性」(prominence)。同樣道理，借用 Wallerstein (1974) 的「世界系統」理論，張讚國指出世界上發生的事件要通過幾個過濾器才可以成為新聞，而事件到底發生在「中心國家」還是「邊緣國家」，就是第一重過濾器 (Chang, 1998)。

對顯要國家的重視，使國際新聞很多時候高度集中於少數幾個國家身上。誇張一點說，一些媒體提供的「國際新聞」，很大程度上可能只是有關幾個國家的新聞。不過，把這一點跟本研究的關注點連結起來，我們或許可以預期，隨着全球化的發展，國際間多邊合作的需要越來越大，而一事件同時涉及多個國家的機會也越來越高，這可能令很多傳統上並非特別顯要的國家多了「曝光」的機會，從而令國際新聞沒有那麼集中於幾個顯要國家身上。由於「國際新聞有多集中於顯要國家身上」是一個將多則國際新聞總結起來才可得出的一個內容特徵，這內容特徵和全球化想像之間的關係不能在新聞故事的層次上分析。為簡單起見，我們以下會在國家層次上來驗證兩者之間的關係，亦即，如果上述的觀點是成立的話，我們可以預期，如果一個國家的電

視國際新聞中越多多國新聞及涉及國際組織的新聞，那麼這個國家的電視國際新聞也應該越不集中於少數幾個國家身上。這是本研究的第二個主要假設：

H2：如果一個國家的電視國際新聞中越多提及國際組織及越多多國新聞，該國家的電視國際新聞也會較少集中於幾個顯要國家身上。

由於本文建基於一個跨國研究之上，我們可以探討在國家層次上，國家特徵和國際新聞內容之間的關係。事實上，H1c與H2均預設了不同國家的電視國際新聞會有不同程度的「不經意的全球化想像」。當然，雖然全球化本身是一個影響全世界的發展趨勢，但不同國家對全球化的參與程度亦可能有所差異。在經濟上，不同國家的經濟體系對外貿有不同程度的依賴；在人口流動上，不同國家的移民政策不一樣，每年接待的外國旅客的數目不一樣；在政治上，不同國家對國際組織及事務亦不會同樣的熱中參與。所以，我們預期，一個國家的電視國際新聞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全球化的現實，可能跟其本身對全球化的參與程度呈正相關。基於經驗數據的限制，我們在以下的分析中只集中於經濟及人口流動這兩方面之上。分析的第三至第五假設如下：

H3：對外貿易對一個國家的經濟越重要，該國家的國際新聞就有更多的多國新聞及國際組織的出現。

H4：一個國家越多接收外國移民，該國家的國際新聞就有更多的多國新聞及國際組織的出現。

H5：一個國家越多接待外國旅客，該國家的國際新聞就有更多的多國新聞及國際組織的出現。

最後，我們亦可以分析媒介機構以至媒體系統的特徵和國際新聞內容之間的關係。H3至H5假設的是一個國家在全球化進程中的客觀位置可能影響該國家的媒體如何看待世界，但媒體的運作往往有自己的邏輯和原則，所以媒體內容反映的不一定是媒體所身處的社會，同樣甚至更加可能的是，媒體內容會反映媒體自身的運作原則和意識型

態。廣義而言，這亦是新聞社會學中其中一個廣被採納的理論觀點 (Tuchman, 1978; Fishman, 1980; Gitlin, 1980)。

從這一點出發，我們可以問，有甚麼樣的媒體特徵會跟「不經意的全球化想像」有關？本研究提出兩個假設。第一，公營廣播及商業廣播之間應有差異。公營廣播以為公眾服務，傳播重要資訊及搭建輿論平台為己任。商業廣播則較重視利潤，所以更傾向看重公眾的興趣而非公眾的利益。固然，在歐洲及世界上很多其他國家中，公營廣播的傳統在過去二十年已受到商業廣播巨大的挑戰，令不少學者都關注公營廣播能否維持自己的風格和責任感，但當未有充份證據顯示兩種廣播機構已經成為一丘之貉前，我們仍可假定傳統的分野仍然存在。更具體地說，公營廣播的電視國際新聞很可能包含更多的涉及多個國家及國際組織的新聞。這是因為涉及多國或國際組織的新聞一般而言既重要但亦比較複雜，商業廣播如果以利潤掛帥，對這類新聞可能給予較少的重視。相反，商業廣播很可能會較看重的衝突、暴力、災難等新聞，除了戰爭及罕見的橫跨國界的大災難外，大部分都是以前單一國家為最重要背景的新聞。所以，我們作出以下的研究假設：

H6：相比於商業機構的電視新聞，公營廣播機構提供的電視國際新聞中有更多涉及多個國家及國際組織的報導。

除了公共與商業之分外，不同電視台在製造國際新聞時所投放的資源不一樣。一些電視台可能完全依賴國際通訊社以及外國新聞媒體為新聞來源，另一些媒體則可能有較多的駐外記者。資源和人手的投放，很可能會影響到國際新聞中對世界的描寫。借用 Tuchman (1978) 的「新聞網」概念，我們可以預期，一個媒體機構如果在國際新聞上投放了更多的資源，其國際新聞的新聞網就應該編織得越為緊密，其國際新聞內容便可能在更大的程度上反映全球化的現實。所以，我們的第七個研究假設是：

H7：一個媒介機構在國際新聞上投放的資源越多，該機構的電視國際新聞就有更多的多國新聞及國際組織的出現。

最後，無論是多國新聞抑或是談論國際組織，背後涉及的都是一

個比過去更為多邊主義及多元的世界格局。如果我們假設一個媒體系統本身的意識型態跟其報導的新聞內容有所對應的話，那麼我們或許可以預期，一個本身越能表達多元觀點的媒介系統，它所報導的國際新聞亦會展現一個越多元的世界觀。換句話說，如果一個國家的媒介系統越多元，其電視國際新聞可能會包含更多的多國新聞及有關國際組織的新聞。因此，本研究最後一個假設是：

H8：一個國家的媒介系統本身越多元，該國家的電視國際新聞就有更多的多國新聞及國際組織的出現。

在進入分析之前，首先要說明的是，以上的研究問題和假設並不完全覆蓋所有可能跟國際新聞中的不經意的全球化想像相關的因素。本文所建基於的跨國新聞研究計劃本來並非特為研究新聞中的全球化想像而設，而一些跟國家狀況或媒介系統相關的跨國數據亦不容易搜集。所以，以上的研究問題和假設只是就新聞中的「不經意的全球化想像」這個未曾有經驗研究關注的問題，根據現有的材料和數據作一盡量系統化的分析。在數據分析之後，我們在討論和結語部分會再詳細討論研究發現的意義、本研究的限制，以及未來研究者可繼續關注的焦點。

研究方法和操作化

以下分析的數據覆蓋有份參與今次跨國國際新聞研究，而在09年底或之前已完成內容分析的16個國家和地區。這16個國家和地區分別為中國大陸、香港、台灣、新加坡、比利時、瑞士、德國、意大利、波蘭、葡萄牙、美國、加拿大、智利、巴西、以色列和埃及。研究的基本設計是讓每個國家或地區的研究隊伍均選擇當地最具代表性的公營電視台和商營電視台各一。當然，由於每個國家的特殊情況，這基本設計不一定可行，如香港及新加坡都只有商營電視台，中國大陸及埃及則沒有西方意義之下的純商業廣播。所以，香港和新加坡選取的是兩間具代表性的商營電視台，²中國大陸只選取了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聯播，而埃及亦只選取了其國有電視台作分析對象。另外，瑞士的研

究團隊共分析了三個電視台的新聞。總括而言，在09年底為止跨國研究數據庫中共包含了31個電視台的數據。

需要在這裏指出的是，在嚴格的意義下，本跨國研究的國家樣本並未有充分的統計學上的代表性。基本上，以或然率抽樣方法來選擇國家是不切實際的。16個國家和地區的選擇很大程度上是基於研究統籌者在不同國家和地區能否找到合適、有興趣，並有資源參與研究的學者。但從現有國家和地區的名單中，我們可見研究已覆蓋亞洲、南北美和中東，而幾個歐洲國家亦包括東歐的波蘭、南部的意大利和葡萄牙、中部的德國和瑞士，以及較北面的比利時。缺乏埃及以外的非洲國家和東亞地區以外的亞洲國家的參與是較令人遺憾的。不過整體而言，本研究仍然是現今罕有的包括多國參與的系統比較研究。

在新聞的抽樣方面，每個國家的研究隊伍都對2008年初四個星期裏每個被選取的電視台每天最重要的新聞廣播進行分析。該四個星期分別為1月20日到26日，2月10日到16日，3月2日到9日，3月23日到29日。不同國家的研究隊伍採用一樣的編碼表，而每個研究隊伍均為自己進行的內容分析進行編碼者之間的效度 (inter-coder reliability) 測試，而本文數據分析中包括的大部分國家或地區均達至了可以接受的編碼效度。³

本跨國研究的內容分析亦包括對本地或本國的新聞進行編碼，但本文的主旨集中在國際新聞的內容上，所以以下的分析包括的是從16個國家和地區而來的總共5,423則國際新聞，而跟研究問題和假設直接相關的變量的操作化方式則如下：

多國新聞及國際組織

在編碼過程中，編碼員會將一則新聞故事中被提及的國家記錄下來，以頭5個國家為限。從原始的編碼結果，我們很容易就可以得知一則新聞涉及的有多少個國家(由1至5不等)。我們在以下的分析會以此為一比率變項 (ratio variable)，代表多國新聞這概念。另一方面，編碼員亦會記錄在一則新聞故事中被提及的國際組織，包括以國家為單位的組織(如聯合國及其附屬機構，或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等區域性聯

盟)，亦包括如紅十字會、國際樂施會等非政府組織。國際組織的記錄以在新聞中頭兩個出現的為限。跟多國新聞的情況一樣，從原始的編碼，我們便可以得知一則新聞有沒有涉及國際組織：完全沒有、一個，或「兩個或以上」。我們以下的分析亦以此為另一比率變項 (ratio variable)。

其他新聞內容變項

新聞故事在議程上的顯著程度由故事的長度以及故事在每日議程中的位置來代表。前者以秒為量度單位，故事佔越多時間自然越為顯著。後者以數值 $1/n$ 來代表，而 n 指該新聞故事是當日新聞廣播中的第幾段新聞。亦即，一天新聞報導中的首則新聞的數值為 1，第二則新聞的數值為 0.5 (1/2)，第三則為 0.33 (1/3)，如此類推。用 1 除以 n 這簡單公式，背後有兩個原因。第一，由於理念上，我們可以假定一則新聞故事的位置越前，其在議程上就越顯著，用 1 除以 n ，我們便會得到一個數值越大，其代表的顯著性就越高的變項，這方便我們對結果的詮釋。第二，用 1 除以 n 後，第一則和第二則新聞的顯著性的差異大於第二則及第三則新聞之間的顯著性的差異，而後者又大於第三則及第四則新聞之間的顯著性的差異。這也跟新聞議程設置的邏輯相符合：甚麼是頭條和「二條」，往往是一天的新聞議程設置的最重要問題，而放到最後位置的幾則新聞，它們的顯著性其實並不算有很大差異。

國際新聞中的國家集中度的測量，借鑒於媒體經濟學中對擁有權集中度的測量方式。在媒體經濟學中，其中一種對擁有權集中度較簡單的測量方式是「集中比率」，就是在一個市場中佔有率最高的幾所機構——通常是 4 所或 8 所——共佔市場的百分之幾 (Albarran, 2002; Hoskins, McFadyen & Finn, 2004)。這集中比率通常以 CR4 和 CR8 表示。用同樣的邏輯，我們先將一個國家的電視國際新聞中所有個別國家的提及總計起來，然後將每一個曾被提及的國家從最多到最少被提及順序排列出來，然後我們便可以很簡單計算出「被報導國家集中比率」。⁴我們採用的是「CR8」，亦即頭 8 個最常被提及的國家共佔所有國家提及次數的比例。而作為一個變項，如果一個國家在這個變項上的

數值越大，就代表其國際新聞越集中在幾個國家身上，亦代表其國際新聞在被報導區域這點上較缺乏多元性。

在這個基礎之上，我們再計算一個「經調整的集中比率」。原因是一個國家的國際新聞可能會高度集中於一個對自己特別重要的國家身上。如本研究中，加拿大的國際新聞中提及其他國家時，就有超過30%是提及美國的，但這並不代表加拿大的電視國際新聞在報導美國之餘，不會較平均地報導其他國家。所以，我們計算一個將最重要的「他國」排除在外的「經調整的集中比率」。簡單地說，就是在撇除最重要的「他國」之後，頭8個最常被提及的國家共佔所有國家提及次數的比例。

我們可以用中國大陸來作例子說明。中央電視台的國際新聞中，最多被提及的是美國，提及次數佔所有國家提及次數的16.0%，其次是日本和英國，兩者同佔5.2%，再其次是俄羅斯(4.9%)、希臘(4.2%)、巴基斯坦(3.6%)、法國(3.3%)及德國(3.3%)。這8個國家被提及的次數加起來，佔所有國家提及次數45.7%。所以，中國大陸在「被報導國家集中比率」這變項上的數值就是45.7%。而如果我們撇除被提及最多的美國，而補上原本排第九位的瑞士(被提及次數亦佔所有國家提及次數的3.3%)，經重新計算，中國大陸電視新聞的「經調整的集中比率」是39.2%。

國家層次及媒介系統變項

有關國家特徵的資料及統計數字，是通過聯合國及世界銀行等主要國際組織的網站取得的。對外貿易對一個國家經濟的重要性由2008年「外貿對本地生產總值比例」來代表，亦即是說，我們將每一個國家2008年的出口總額和入口總額的總和，除以每個國家當年的本地生產總值，比例越高，代表外貿對該國經濟體系越重要。人口流動方面，吸收移民的比例由移民人口數量按年變化以及移民人口佔總人口比例來代表。至於接待外國旅客，則是每個國家在2008年接待的外國旅客總人數。這幾個變項是測試H3至H5的基礎。

媒介系統特徵，則不一定可以用客觀的測量或統計數字來代表。

作為跨國研究的一部分，每個參與國家或地區的研究隊伍都被問及自己地區的媒體系統的特徵，其中包括研究員自己認為自己地區的媒體系統有沒有表達多元觀點，研究員可選擇的答案為多元程度低、中、或高。我們將以這變項測試H8。至於投放在國際新聞的資源，每個研究隊伍亦被問及自己地區的電視台有多少駐外記者。由於不是每個國家或地區的研究隊伍都能給予準確數字，我們將這變項亦變為一個只有三個範疇的變量，1代表完全沒有或只有非常少量駐外記者(約10人或以下)，2代表有一些駐外記者(10數人至約20人)，3代表有不少駐外記者(20多人或以上)。我們將以這變項測試H7。但個別地區的隊伍未能提出約略估計，所以H7的測試並不能覆蓋31個電視台。

至於跟H6有關的公共與商業之分，表面上較為簡單。每個國家或地區的研究隊伍均根據概念上的公共與商業之分，以及每個國家或地區的實際環境來將自己所選取的電視台歸類。不過，16個國家地區之中，只有12個地區既有公營亦有商業廣播。香港和新加坡只有商業電視台，中國大陸及埃及則只有公營廣播。更重要的是，中國大陸及埃及的公營廣播，跟歐洲的公共廣播其實差異頗大。另外，在以上已經提及，就算是歐洲的公共廣播機構，在過去20年來也受到或多或少的商業廣播的衝擊。具體地說，一些公共廣播機構今時今日也可能要透過廣告獲取收益。所以我們在以下的分析中亦用上了另一變項，就是每個電視台的收入來源有多大程度上基於廣告，每個電視台在這個變項上的數值取決於每個地區的研究隊伍的判斷和認知(在變項上的具體數值為1至6，1代表完全沒有廣告，2代表25%或以下的收益來自廣告，如此類推，6代表完全依賴廣告收益)。這個變項可以讓我們脫離簡單的公共/商營的二分法，以稍為不同的角度去探究H6，亦即去探究不同程度的商業取向會否影響新聞內容。

以上個別有關媒體系統或機構特徵的變項以各地研究隊伍自己的判斷作為標準，其效度無可否認會較成疑問。我們在討論研究結果時應記着這一點。但由於資源所限，我們現時只可以用這些變量作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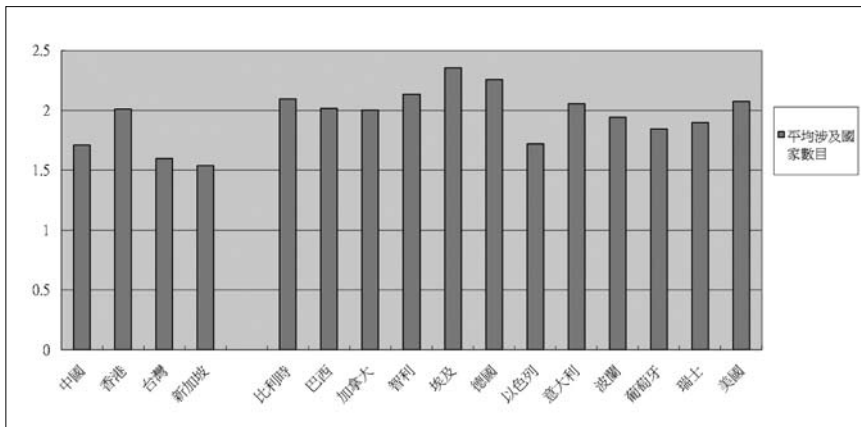
數據分析及結果

多國新聞及國際組織的出現次數

現在我們可以開始分析數據。RQ1 和 RQ2 關注的是多國新聞和國際組織的出現次數。分析結果顯示，在 5,408 篇能在涉及國家數目這項上得出有效結果的國際新聞中，42.9% (2,322 篇) 只涉及一個國家，涉及兩個國家的佔 32.8% (1,744 篇)，涉及三個國家或以上的佔 24.3% (1,312 篇)。從表面上看，涉及多國的國際新聞似乎仍未主導本研究包括的國家地區的國際新聞內容。

而從比較的觀點看，我們發現不同國家的國際新聞中的確有不同比例的多國新聞。圖一總括了分析結果。在埃及，平均每則電視國際新聞故事提及 2.35 個不同的國家，而這亦是 16 個國家和地區之間最高的數字。在另一端的是新加坡，平均每則電視國際新聞故事只提及 1.54 個國家。事實上，台灣和中國大陸的國際新聞中，都有較少的多國新聞，在這兩個地區的數字分別是每則電視國際新聞提及 1.60 個國家及 1.71 個國家。在香港的相應數字則是 2.01 個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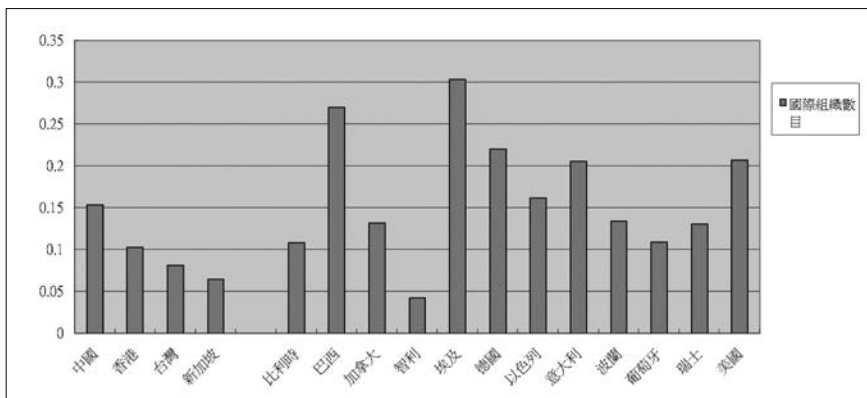
圖一：不同國家的電視國際新聞中平均每篇新聞所涉及的國家和地區數目



國際組織方面，研究所包括的地區的國際新聞似乎仍然不太聚焦於國際組織之上。在5,423篇新聞中，有提及至少一個國際組織的只有714個故事，佔總數的13.2%，其中625個故事只提及一個國際組織，89個故事則提及兩個或以上的國際組織。換句話說，內容分析總共記錄了803次國際組織的出現(625 + 89 × 2)。總計起來，聯合國及其附屬組織出現次數共237次。其次，由於研究包括了多個歐洲國家，歐盟及其附屬組織出現的次數亦不少，共佔200次。此外，歐盟以外其他地區的，以國家為單位的區域性或利益性國際聯盟，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東南亞國家聯盟(ASEAN)等，共出現116次。國際恐怖組織則共出現127次。國際非政府組織再加上各種各樣不屬於以上的範疇的組織共出現不過123次，可見國際非政府組織並未見在國際新聞中有很高的曝光率。

比較不同國家的國際新聞，圖二顯示，跟多國新聞一樣，提及國際組織最多的也正是埃及的國際新聞，平均每篇新聞有0.30個國際組織被提及，也就是，在大概10則國際新聞中，國際組織會出現三次。另外，也跟多國新聞類似的，是新加坡和台灣的國際新聞也罕見國際組織的出現(分別為每篇新聞有0.06和0.08個國際組織被提及)。不過，最少提及國際組織的是智利的國際新聞，每篇新聞只有0.04個國際組織被提及。換句話說，約每25篇智利電視台的國際新聞中，國際組織才會出現一次。

圖二：不同國家的電視國際新聞中平均每篇新聞所涉及的國際組織數目



以上的文字已經暗示了多國新聞及國際組織的出現是有一定的關聯的。以新聞故事作為分析單位，我們會發現提及國家的數目跟提及國際組織的數目呈統計學上顯著的正相關 ($r = .25, p < .001, N = 5,408$)。亦即是，一則新聞若提及國際組織，其提及的國家數目亦會較多。以電視台為分析單位，兩個變項之間亦有顯著的正相關 ($r = .56, p < .01, N = 31$)。亦即，一個電視台的國際新聞若出現越多的多國新聞，其國際新聞亦會較多提及國際組織。最後，以國家媒體作為分析單位，雖然有效本數會大幅降至16，但兩個變項之間仍然有統計學上顯著的正相關 ($r = .55, p < .03, N = 16$)。這些結果支持了H1a至H1c，亦為本研究的其中一個論點——多國新聞及國際組織的出現可以被視為指向同一種世界想像的指標——提供了基礎。

多國新聞及國際組織和其他新聞內容特徵的關係

在完成基本的描述之後，我們可以分析兩個關鍵指標跟其他新聞特徵的關係。RQ3關注的是多國新聞及國際組織，無論它們出現的頻率有多高，它們會否在新聞議程中佔較重要的位置。我們主要用相關系數分析來解答這問題。但需要指出的是，多國新聞及國際組織在新聞議程上的顯著性可能在每一個國家甚至電視台不一樣。但為了相對簡單起見，我們在進行分析時將每個國家或地區分別開來（而不將每個電視台分開）。由於新聞議程中的顯著性由兩個變量來代表（議程位置及故事長度），所以我們的分析會為每個國家得出共4個相關系數。表一以總括的方式顯示了分析結果。

表一：多國新聞及國際組織在新聞議程中的顯著度

	提及的國家數目		提及的國際組織數目	
	議程位置	故事長度	議程位置	故事長度
中國大陸	.27***	.28***	-.10	-.08
台灣	.14	.20**	.04	.01
香港	.17*	.19*	-.03	.09
新加坡	.11*	.03	.06	.03

(續上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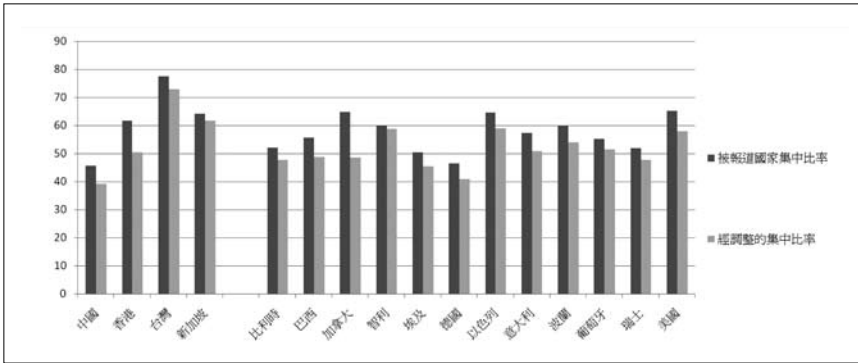
比利時	.08	.16***	.06	.13**
巴西	.18**	.39***	.19**	.27***
加拿大	.11*	.34***	.09	.17***
智利	.28***	.35***	.32***	.11**
埃及	.28***	.35***	.18***	.22***
德國	-.05	.27***	.07	.08
以色列	.45***	.22***	.28***	.13**
意大利	.12	.18**	.13*	.21***
波蘭	.23**	.21**	.14	.07
葡萄牙	.05	.01	.02	.03
瑞士	.14**	.23***	.03	.12**
美國	.03	.13	-.15	.21**

註：表中顯示的是第一列所示變項和第二列所示變項之間，在個別國家的國際新聞中的相關係數。*** $p < .001$ ；** $p < .01$ ；* $p < .05$ 。

無論是議程位置或故事長度，變項都是數值越大就代表新聞故事的顯著性越高。所以，如果提及的國家數目或提及的國際組織數目跟這兩個變項有正相關，就會代表這些提及多個國家或國際組織的新聞會越顯著。而在表一中我們發現，提及國家數目越多的新聞或是提及國際組織越多的新聞，在大部分國家或地區的國際新聞中都比提及國家數目小的新聞或沒有提及國際組織的新聞在新聞議程中佔據更顯著的位置。例如提及國家數目跟新聞長度的相關係數，在16個國家或地區中都是正面的，而相關係數在其中13個地區達至了統計學上的顯著水平。同樣地，提及的國際組織數目跟故事長度的相關係數，在16個地區中的15個地區都呈正面，而其中有9個相關係數達至了統計學上的顯著水平。換一種說法，表二顯示了共64個相關係數，其中37個達至了統計學上的顯著水平，而這37個相關係數全部都指向同一方向，就是多國新聞或涉及國際組織的新聞在新聞議程中佔更顯著的位置。這亦是表二給予RQ3的答案。

H2 提出，在國家的分析層次上，如果一個國家的電視國際新聞中越多提及國際組織及越多多國新聞，該國家的電視國際新聞也會較少集中於幾個國家身上。在以上有關研究方法的一節中已解釋，是次分析借鏡媒體經濟學中的「CR8」，建構了「被報導國家集中比率」及「經調整的集中比率」兩個指標。圖三首先展示了不同國家的電視國際新聞在這兩個測量上的數值。在 16 個國家或地區中，無論是用那一個數值，被報導國家的集中比率最高的是台灣（兩個數值分別為 77.6% 及 73.0%），而集中比率最低的是中國大陸（兩個數值分別為 45.6% 及 39.2%）。

圖三：不同國家的電視國際新聞中被報導國家的集中比率



對 H2 的測試方式很簡單，就是圖三展示的兩個測量與國家層次上的多國新聞數目及國際組織被提及的頻率作相關分析。結果在方向上符合 H2。提及的國家數目及兩個測量均有負面的相關：如果一個國家的電視國際新聞越多多國新聞，其國際新聞亦會沒有那麼集中於幾個重要國家之上。多國新聞與「被報導國家集中比率」的相關系數未能達致傳統的統計學顯著水平 ($r = -.47, p < .07, N = 16$)，但其與「經調整的集中比率」的相關系數則達致了傳統的統計學顯著水平 ($r = -.52, p < .04, N = 16$)。同樣地，提及的國際組織數目及兩個測量亦有負相關，其中提及的國際組織數目與「經調整的集中比率」的相關系數非常接近傳統的統計學顯著水平 ($r = -.49, p < .06, N = 16$)。所以，在嚴

格意義下，H4並未得到全面的支持，但需要留意的是，在國家層次的分析中，有效樣本數只有16，任何的統計分析要達致傳統的統計學顯著水平絕不容易。將這一點考慮在內的話，支持H2的統計證據其實已經非常不俗。

多國新聞及國際組織新聞和國家及媒介特徵的關係

我們現在可以檢驗幾個有關國家及媒介特徵的假設。H3至H5指，如果一個國家跟世界其他地方的關係越密切，其國際新聞就很可能有更多涉及多個國家及國際組織的新聞。表二展示了有關的結果。整體而言，假設並不成立。相反，在第一列中，我們發現外貿的重要性跟國際新聞中提及國際組織的數目有統計學上顯著的負相關，而第二及第三列中，我們亦見到移民人口跟國際新聞中提及的國家數目有負面的關係，雖然這些負相關並未達至統計學上的顯著水平。這些結果指向的是如果一個國家跟世界其他國家的關係越密切，其國際新聞內容反而有更少多國新聞和涉及國際組織的新聞。

表二：多國新聞/國際組織和國家特徵的關係

國家特徵	提及的國家數目	提及的國際組織數目
外貿對本地生產總值比例	-.37	-.54*
移民人口按年變化	-.17	-.38
移民人口比例	-.50^	-.39
接待外國遊客數目	.22	.32

註：表中顯示的是相關系數。* $p < .05$; ^ $< .06$; $N=16$ 。

我們在討論和結語部分會嘗試提出一些關於這些結果的可能的詮釋。但在進入總結討論前，我們要先討論有關H6至H8的結果。H6假設公營廣播的國際新聞會更多涉及多個國家及國際組織。跟RQ3的分析一樣，我們將不同國家和地區分開處理。但由於中國大陸、香港、

新加坡和埃及只有一個類型的新聞機構，所以表三只有12個地區。統計分析方法是獨立樣本 t-test。

表三：公營及商業廣播中的多國新聞及國際組織

	提及的國家數目		提及的國際組織數目	
	公營廣播	商業廣播	公營廣播	商業廣播
台灣	1.71 _a	1.40 _a	0.11 _b	0.03 _b
比利時	2.11	2.06	0.12	0.09
巴西	1.96	2.08	0.22	0.33
加拿大	2.14 _c	1.86 _c	0.16	0.11
智利	2.20	2.08	0.04	0.05
德國	2.45 _d	2.10 _d	0.29 _e	0.16 _e
以色列	1.92 _f	1.58 _f	0.22 _g	0.12 _g
意大利	2.07	2.03	0.19	0.23
波蘭	2.03	1.83	0.20 _h	0.05 _h
葡萄牙	1.84	1.85	0.11	0.10
瑞士	1.95 _i	1.59 _i	0.14 _j	0.05 _j
美國	2.15	1.97	0.20	0.22

註：表中顯示的是每個國家的公營或商業廣播新聞在第一列所示變項上的平均值。如果兩個平均值的右邊加上了同一個英文字母，就表示兩個平均值之間在通過獨立樣本 t-test 時展示了統計學上的顯著差異（以 $p < .05$ 為標準）。

表三顯示，並不是每一個國家中公共和商業廣播之間都有統計學上的顯著差異，但整體而言，表三顯示了一定數量的顯著統計分析結果，而且這些顯著的統計分析結果都一致地指向同一方向。具體點說，表三總括了的有24個獨立樣本 t-tests，其中有10達到了統計學上的顯著水平，而這10個結果全部都跟H6吻合。在台灣、加拿大、德國、以色列和瑞士，公共廣播的國際新聞比商業廣播的國際新聞有更多涉及多個國家的新聞。而在台灣、德國、以色列、瑞士和波蘭，公共廣播的國際新聞比商業廣播的國際新聞有更多涉及國際組織的新

聞。其他國家或地區的公共及商業廣播之間雖然沒有跟H6吻合的差別，但至少它們並沒有跟H6相反的差別。

在研究方法一節中我們提到，除了簡單的公共與商營二分法之外，我們亦可以用另一個變項來探討H6。這另一變項就是每個電視台的收入來源有多大程度上基於廣告。由於這變項以電視台為單位，所以我們可以求證的，是一個越不依賴廣告收益的電視台，其國際新聞是否真的有較多的多國新聞及涉及國際組織的新聞。相關系數分析發現結果確實如此。廣告收入比例與多國新聞的相關系數為 $-.36$ ($p < .05$, $N=31$), 而廣告收入比例與國際組織新聞的相關系數則為 $-.37$ ($p < .04$, $N=31$)。總括表三以及這個額外的分析，H6得到有力的支持。

表四：多國新聞/國際組織和媒體特徵的關係

	提及的國家數目	提及的國際組織數目
<u>媒介機構或系統特徵</u>		
機構駐外記者數量 (N=18)	.43 [^]	.48*
媒體系統內的意見多元性 (N=16)	.53*	.25

註：表中顯示的是相關系數。* $p < .05$; [^] $< .08$ 。

最後，表四顯示了關於H7和H8的結果。跟H7相吻合，一個媒介機構派出越多的駐外記者，其國際新聞就有更具「全球性」的視野，有更多提及多個國家及提及國際組織的新聞。雖然其中一個相關系數差一點才能達至傳統的統計學顯著水平，但如之前曾指出，在國家或電視台的分析層次上，有效樣本數較小。在這背景下，表四的結果對H7應該已經提供了頗有力的支持。同時，H8也得到了數據的部分支持。表四中兩個跟H8有關的相關系數都如預期般指向正相關，其中媒體系統內的多元性跟提及國家數目的相關系數更達至了統計學顯著水平。亦即是說，如果一個國家的媒體系統越能容納多元聲音，其國際新聞也有更多的多國新聞。

討論及結語

本文從「不經意的全球化想像」這一概念出發，以多國新聞及國際組織的出現作為指標，分析當今世界上不同國家的國際新聞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在全球化趨勢之下各國事務越傾向產生相互影響，往往需要多國合作或協商來解決問題的現實。研究旨趣在於電視國際新聞是否不經意地為人們提供了一幅全球化下的世界景像。總括數據分析，我們發現多國新聞及國際組織並未完全主導國際新聞。接近一半的國際新聞仍只涉單一國家，而國際組織的出現頻率更少。當然，本研究缺乏一個歷史階段的比較，我們不清楚多國新聞及涉及國際組織的電視國際新聞是否已經比10年或20年前要多。同時，本研究分析的是四個星期的新聞報導，如果這四個星期剛剛包括了一次主要的國際組織會議，分析得出的數字可能會頗不一樣。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我們分析的期間是08年初，其中已經包括了奧運聖火開始在各國傳送的情況。另外，在編碼的時候，一個國家只要被「提及」，它就會被記錄下來，例如一篇有關某個國家發生的一場意外的報導，只要那篇報導提及該意外怎樣影響了從另外一個國家而來的遊客，整篇報導就已經會成為「多國新聞」。所以，以上分析中的所謂「多國新聞」其實並不須要被報導的事件真的對多個國家同樣有很深遠的影響，亦不需要報導對一事件如何跟多個國家有所關聯有詳盡的分析。在這個意義下，一篇新聞要涉及多個國家其實並不難。再者，就算在全球化還未成為一個常用詞之前，總會有不少國際新聞——尤其有關外交的新聞——會涉及多個國家。考慮到這些因素，本研究發現的多國新聞及涉及國際組織的新聞的比例似乎確實不高。全球化的發展似乎仍未真正成為電視國際新聞內容的背景假設。

如果這個結論是成立的話，那麼原因是新聞工作者對全球化的意識不足、是新聞工作者仍習慣於以單一國家作為單位的思考模式，抑或是新聞製作過程中的限制呢？一個內容研究固然不能為這問題提供完善的答案，但我們的分析亦發現電視新聞並非不重視全球化的發展。在不少國家的電視新聞中，一則國際新聞涉及的國家數字越多，它在新聞議程中的位置就越顯著。同樣，在不少國家的電視新聞中，

涉及國際組織的新聞在新聞議程中的位置亦較不涉及國際組織的新聞顯著。所以，傳媒機構對全球化似乎並非完全沒有意識，未來的研究若探討一些有關國際新聞製作過程的因素，可能更能讓我們了解多國新聞及涉及國際組織的新聞數量偏低的情況。

從比較的角度看，各國的新聞媒體對全球化的反映程度有明顯的差異。其中，是次比較研究所包括的四個華人社會的電視新聞，相比起其他12個國家和地區的電視新聞似乎有更少的多國新聞及提及國際組織的新聞。甚麼因素解釋這些國與國之間的差異呢？在描述性的層次之外，本文的數據分析亦探討了新聞裏的全球化想像和國家及媒介特徵之間的關係。我們從一個較直覺性的觀點出發，預期在一個跟國際社會關係越緊密的國家中，其電視國際新聞應在更大程度上反映全球化的進展。但經驗資料並未支持這個觀點，而個別的結果甚至與這個觀點相反，例如在一個外貿對經濟很重要的國家中或在一個移民人口比例高的國家中，其電視國際新聞反而有更少的多國新聞及提及國際組織的新聞。

我們在這裏只能為這些意外結果提供一些臆測。首先，我們不能否定，以上提及的結果可能只是因為是次研究包括在內的國家或地區碰巧包括了一些「特例」所致。國家層次的研究，如有關經濟全球化對國家經濟發展的影響的研究，往往會因為一兩個特殊的國家而令結果有所改變(Stiglitz, 2003)。而在今次研究中，當分析到全球化想像跟國家特徵的關係時，新加坡和香港似乎是兩個「特例」。⁵這兩個背景非常相似的地區的經濟都特別的依賴外貿，而至少在聯合國的數字中，兩地的移民人口比例亦特別高。同時，正如圖一及圖二顯示，這兩個地方——尤其是新加坡——的國際新聞，都有特別少的多國新聞及提及國際組織的新聞。所以，表二顯示的結果的實際意義有多大，需要繼續的和更深入的研究去分析。

但如果我們撇除特例的影響的話，有沒有理由相信外貿的重要性及移民人口比例和跟電視新聞上的全球化想像有負相關呢？在這裏，我們可能要分辨清楚「跟全球化有緊密關連」和「跟其他國家有緊密關連」兩點。我們的研究假設是建基於我們認為「跟全球化有緊密關連」的國家應有甚麼特點之上。但外貿的重要性及移民人口比例所代表

的，卻可能只是一個國家跟其他個別國家有多緊密的關連。事實上，一個國家不會跟「全球」進行貿易。所謂外貿對一個國家很重要，可能是跟少數幾個國家的貿易很重要。同樣道理，每一個移民均來自個別國家，一個國家移民人口比例高，可能是由於這個國家由少數幾個國家吸收特別大量的移民所致。⁶如果是這樣的話，這些國家便可能更傾向保持原有的，世界由獨立而具主權的國家而構成的世界觀 (Anderson, 1991)。

無論如何，將來的研究可能需要對一個國家跟「全球化」的關係有更深入和精確的概念分析，才能更清晰的了解一個國家在全球化的位置如何影響其國際新聞。當然，另一個可能是國家的客觀特徵對國際新聞根本沒有太大影響。新聞始終是由媒介系統中個別傳媒機構生產出來的，所以媒體機構及系統的特徵可能跟新聞內容的關係更大。而我們的研究發現亦似乎指向這一點。我們發現，在不少國家之中，公營跟商業廣播機構的國際新聞的確在不同的程度上反映了全球化的現實。同時，媒介機構越依賴廣告收入，其國際新聞就越少多國新聞及涉及國際組織的新聞。我們亦發現，派出越多駐外記者的媒體機構，其國際新聞就有更高程度的全球化想像。更有趣的是，如果傳媒系統本身在意識型態和觀點上多元化，其國際新聞亦會在更大程度上包含具有多元化或多邊化意味的全球化想像。相比起客觀的社會狀況，新聞反映的更多是傳媒本身的性質。這亦跟傳統新聞社會學的觀點吻合 (Tuchman, 1978; Fishman, 1980; Gitlin, 1980)。

值得一提的是，不同國家和地區的電視台，都會在不同程度依賴國際新聞通訊社或其他國家的新聞機構所提供的新聞故事或原材料，這代表電視台提供的世界圖像不一定是由電視台自己建構的。不過，我們對電視台特徵和新聞內容特徵的關係的分析，顯示電視台的特徵的確對國際新聞內容有影響。這代表的是，無論一個電視台在多大程度上依賴其他機構提供國際新聞，它對自己播出的國際新聞仍然會打下自己的印記。這可能是電視台因應自己的特質和需要選擇不同的國際新聞來源，可能是電視台對從國際新聞通訊社來的新聞因應自己的特質和需要進行選擇性的報導，或甚至對從國際新聞通訊社來的新聞故事再作適當的「後期加工」。總的而言，不同電視台所提供的國際新

聞在內容上有具系統性的差異，代表電視台不只是傳送國際新聞通訊社所建構的世界圖像而已。

誠然，作為國際新聞內容如何反映全球化的研究，本文只是一個起步。在本文所屬的跨國研究的範圍內，我們仍然有不少變量或因素未有考慮在內。例如多國新聞的比例很可能在不同的議題上會不一樣：環保、國際政治、經濟等新聞涉及多個國家及國際組織的機會應較大，而社會事務如教育、福利、房屋等新聞則可能較少涉及多個國家及國際組織。我們亦未將「不經意的全球化想像」與近年不少國際新聞研究者關注的國際新聞本地化的問題(Cohen, Levy, Roeh, & Gurevitch 1996; Lee et al., 2002; Silcock, 2002; Clausen, 2004)連繫起來。另外，我們對國際組織亦可作更深入的分析，本文已指出，國際組織出現次數少，而某些類型的國際組織出現次數可能更少。究竟不同類型的國際組織在不同議題上會以甚麼樣的形式出現，這本身也是一個值得繼續探討的題目。本文沒有處理以上問題，一方面是因為篇幅所限，另一方面是要保持文章及分析的連貫性。但我們會在將來的分析中嘗試處理它們。

最後，本文的分析只集中於國際新聞，但「不經意的全球化想像」這概念其實也適用於分析本地新聞。當一個電視台在處理一則本地新聞時，它會否把事情放到一個跨國或甚至全球的框架中去理解？本地新聞中會否出現國際組織及在多大程度上會提及其他國家？這些都是可以在未來的分析中處理的問題。

註釋

1. 以香港作為一實例，在97回歸之前，媒體多以「中國總理」及「中國國家主席」等來稱呼中國國家領導人。但97回歸之後，媒體就開始略去「中國」二字。
2. 香港的研究團隊實際上分析三個電視台的國際新聞，但被納入跨國研究數據庫中的只有其中兩個電視台的數據。
3. 空間所限，我們不能在此列出每個研究隊的內容研究中每個變項的效度。但可以指出的是，研究的總負責人Akiba Cohen對每個研究隊的研究方法及水平一直有所關注。而在研究過程中亦曾有個別國家的研究隊因未能達

至整個跨國研究所採納的要求和標準而退出。

4. 電視國際新聞也不時會提及電視台身處的國家或地區本身。我們在計算集中比率時將電視台所屬的國家本身排除在外。
5. 值得在這裏指出的是，受特例影響和樣本的代表性沒有必然的關係。一個很具統計學代表性的樣本同樣可以受「特例」影響。例如經濟學家Stiglitz (2003) 討論全球化對經濟發展是否真的有正面影響時，便指出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強調的兩者的正相關，是中國和印度兩個「特例」造成的。
6. 事實上香港的情況就是如此，聯合國數據中指的香港的外地移民，應有大量是由中國內地到香港的移民。

參考文獻

- Albarran, A. (2002). *Media economics*, 2nd ed. Iowa: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Anderson, B. (1991). *Imagined communities*. London: Verso.
- Billig, M. (1995). *Banal nationalism*. London: Sage.
- Chang, T. K. (1998). All countries not created equal to be news: World system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5 (5), 528–563.
- Chang, T. K., Shoemaker, P. J., & Brendlinger, N. (1987). Determinants of international news coverage in the United States media.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4 (4), 396–414.
- Clausen, L. (2004). Localizing the global: “Domestication” processes in international news production.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6 (1), 25–44.
- Cohen, A., Levy, M. R., Roeh, I., & Gurevitch, M. (Eds.) (1996). *Global newsrooms, local audiences*. London: J. Libbey.
- Della Porta, D. (2006). *Globalization from below*.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DeLuca, K. M., & Peeples, J. (2002). From public sphere to public screen: Democracy, activism, and the “violence” of Seattle.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 19 (2), 125–151.
- Edensor, T. (2002). *National identity, popular culture and everyday life*. New York: Berg.
- Fishman, M. (1980). *Manufacturing the news*. Austin, Texas: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Galtung, J. & Ruge, M. H. (1965).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news: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Congo, Cuba and Cyprus crises in four Norwegian newspaper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2, 64–91.
- Giddens, A. (1991).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Giffard, C. A., & Rivenburgh, N. K. (2000). News agencies, national images, and global media event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77 (1), 8–21.
- Gitlin, T. (1980).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abermas, J. (2001). *Post-national constellations: Political essays*. Mass.: MIT Press.
- Held, D. (1995). *Democracy and the global ord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Held, D., & McGrew, A. (Eds.) (2002). *Governing globalization: Power, authority and global governance*. London: Polity Press.
- Hoskins, C., McFadyen, S., & Finn, A. (2004). *Media economics: Applying economics to new and traditional media*. CA: Sage.
- Johnson, M. A. (1997). Predicting news flow from Mexico.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74 (2), 315–330.
- Kim, K., & Barnett, G. A. (1996). The determinants of international news flow: A network analysi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3 (3), 323–352.
- Latham, K. (2009). Media, the Olympics and the search for the “real China.” *China Quarterly*, 197, 25–43.
- Lee, C. C., Chan, J. M., Pan, Z. D., & So, C. Y. K. (2002). *Global media spectacle*. New York: SUNY.
- Lee, F. L. F. (2008). Local press meets transnational activism: News dynamics in an anti-WTO protest.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 (1), 57–78.
- Lee, F. L. F., Lee, C. C., He, Z., Lin, W. Y., & Yao, M. Z. (2009). The attitudes of urban Chinese toward globalization: A survey study of media influence. *Pacific Affairs*, 82 (2), 211–230.
- Lippmann, W. (1997/1922). *Public opinion*. New York: Free press.
- McFarlane, T., & Hay, I. (2003). The battle for Seattle: protest and popular geopolitics in The Australian newspaper. *Political Geography*, 22 (2), 211–232.
- Nayyar, Deepak (Ed.) (2002). *Governing globalization: Issues and institu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erone, J., & Barnhurst, K. (2001). *The form of news*. New York: Guilford.
- Robertson, R. (1992). *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 London: Sage.
- Silcock, B. W. (2002). Global news national stories: Producers as mythmakers at Germany’s Deutsche Welle television.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79 (2), 339–352.
- Sassen, S. (1991).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tiglitz, J. E. (2002). Glob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D. Held & A. McGrew (Eds.), *Governing globalization: Power, authority and global governance* (pp. 47–67). London: Polity Press.

- Swain, K. A. (2003). Proximity and power factors in western coverage of the sub-Saharan AIDS crisi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80 (1), 145–165.
- Tarrow, S. (2005). *The new transnational activis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uchman, G. (1978). *Making news*. New York: Free Press.
- Wallerstein, I. (1974).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 London: Academic Press.
- Wu, H. D. (2000). Systemic determinants of international news coverage: A comparison of 38 countrie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0 (2), 110–130.
- Wu, H. D. (2003). Comparing the systematic determinants of international news flow betwee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Gazette*, 65 (1), 9–24.
- Zhao, Y. Z. (2003). “Enter the World”: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the dream for a strong nation, and Chinese press discourses on the WTO. In C. C. Lee (Ed.), *Chinese media, global context* (pp. 32–56). London: Routledge.